

明人編選漢魏六朝

詩歌總集研究

◎楊 焄 著

詩自蕭選作而漢魏六朝詩集不復見。李唐興而六朝詩聲
黜不徒更其辭抑復憚其義奚所尋源於三百篇
乎余述是編不專步驟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參入
之於楊左則加精於李鍾則加博庶幾選古之一
變云

一是編分體有五曰古歌謠辭虞舜卿雲以下是也
曰古逸雜篇琴操以下是也曰漢歌謠辭高祖大
風以下是也曰樂府安世房中以下是也

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研究成果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B404）研究成果

明人编选汉魏六朝 诗歌总集研究

◎ 杨 焄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研究/杨焄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450-0562-2

I.明… II.杨… III.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②古典诗歌—编辑工作—中国—明代 IV.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8021号

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研究

杨焄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

(西安长安南路181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天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7.875印张 200千字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50-0562-2

定价:16.00元

序 一

王运熙

中国古代集部典籍，除楚辞类以外，主要是别集、总集两大类。别集是单个作者的作品集，而总集则是多个作者的作品集。总集又有两种情况：一在求全，网罗有关作品，巨细无遗，如《全唐诗》《全唐文》；一在求善，选择编选者认为好的作品，是总集中的选本，如《唐诗别裁集》《唐诗三百首》。

汇集多个作者的集子，起源颇早。《诗经》三百篇，出自众手，实际上是总集。因被认为经过孔子删订，被尊为经。《楚辞》由汉代刘向编录，收集屈原、宋玉等人辞赋数十篇，实际上也是总集。因其产生年代早，影响深远，与《诗经》被后人相提并论，尊为辞赋的老祖宗，故目录学家在集部中首列楚辞类。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被认为是首出的总集，可惜早已失传。今存传世的最早总集，是南朝梁代萧统所编选的《文选》。

中国古代前中期（南朝唐宋）的总集，以选本为主。据《隋书·经籍志》叙说，建安以后辞赋等作品繁多，览者阅读劳倦，挚虞“芟剪繁芜”，选择精华，编成《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此后南朝唐宋时期，总集大抵是选本。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一百卷，是汉魏至唐五代的乐府诗全集；洪迈所编《万首唐人绝句》一百卷，是唐人绝句的全集。这种求全的总集，在当时还比较少见，其编录对象

的范围也较为窄小。宋初李昉等所编《文苑英华》有一千卷，卷帙浩繁，体例规仿《文选》，选录南朝梁代至唐五代作品，仍是选本。南宋陈起《江湖小集》九十五卷，编录南宋诗六十餘家；陈思《两宋名贤小集》三百八十卷，编录两宋人诗一百五十餘家，二书虽非全集，但均是规模宏大的选本。

至明代，总集刊本更是明显增多，其中包括一部分卷帙颇多的全集。冯惟讷《古诗纪》汇编先秦至隋代诗，共一百五十六卷，现代学者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均以此书为基础重编。梅鼎祚汇编历代文章，分为皇霸（先秦）、西汉、东汉等十餘编，合计约有两百卷，成为清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前驱。明末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汇编了汉魏六朝时期一百零三家的全部作品。以上三家均属全集性质。又张之象的《古诗类苑》一百三十卷，分类編集唐以前诗，虽非全备，网罗亦颇广泛。明人对唐诗的辑集汇编也颇为重视。胡震亨编《唐音统签》一千餘卷，搜集了全部唐诗，是清代《全唐诗》的前驱。张之象又有《唐诗类苑》二百卷。汉魏六朝唐代诗文，至明代历时久远，屡经战乱，散佚甚多，客观上有搜集、整理、刊刻的需要。明代文学界复古思潮活跃，前、后七子等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类主张，重视学习、取法唐代及唐以前的作家作品。当时雕版印刷业进一步发展，出书便利。这些都是促使有关汉魏六朝唐代的大中型总集（包括较多全集）纷纷出现的重要原因。

明人所编汉魏六朝诗文总集，颇有价值，既有搜集遗逸、考订异文等文献价值，有的选本，还表现了编者独到的文学见解（如《诗归》），因而值得重视和研究。但如对这方面诗文总集作全面研究，因其数量繁多，需写一部数十万字的大书。杨焄同志有鉴于此，就明代中后期人所编汉魏六朝诗歌总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钻研和论

述。全书除引言和结语外,共有五章。第一章为概说,鸟瞰全貌,简明扼要。后四章按时代先后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各选若干部重要总集加以考索论述。对每一部总集的编者生平与著述、版本刊刻情况、书的体例与文献价值、理论价值及其不足之处等等,一一作了梳理分析,条理井然,议论平正通达,在吸取前人、现代学者意见的基础上,断以己意,做出了细致、全面、合理的解释与论断,表述清晰,使全书具有较高的开拓创新意义与学术性,对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均富有参考价值。希望著者或其他学者继续努力,对明人所编汉魏六朝唐代较重要的诗文总集,除本书论述者外,一一加以梳理评述,使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更趋完整,裨益学林。

序 二

杨 明

杨焄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研究》将要出版,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杨焄同志从1999年开始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由我担任指导教师;后因成绩优异而直升攻读博士学位,仍由我指导。将近六年的时光,我深感他对于所学的专业充满热情,如饥似渴地汲取、积累知识。他读书细致,对于传统的文献学方面的知识尤其感兴趣,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毕业后他有幸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优点,发扬光大,奋进不已,这是最令人感到欣慰的。

《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研究》正是从扎实的文献调研出发,对于出现在明代中后期的何景明《古乐府》等十六种汉魏六朝诗歌总集加以全面的研究。举凡诸集的时代、编者、编辑过程、版刻源流、内容特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无不细加研讨;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论述诸集的编撰与当时诗坛风气的关系,让读者可以从中窥见明代诗歌创作与批评潮流的消长变化。杨焄同志本着竭泽而渔的态度,搜集、分析资料,细大不捐,乐此不疲,甚至今人所编油印本书目在图书馆束之高阁者,也未能逃脱其渔猎范围。经眼既多,自然就能道人之所未道。试举一例:关于《六朝诗集》的

编者,明清时的一些目录专书,因该书前有薛应旂序,乃著录为薛氏所编;近人或推测为谢枋得编,或认为是徐献忠编。本论文一一加以考辨,认为这些说法都不足据,并提出该集与毗陵蒋孝主持刊刻的《唐十二家诗集》在刻工、作序者、丛编形式等方面多有共同之处,因此《六朝诗集》很可能也是蒋氏编订刊行的。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可信的推断。若非广泛浏览、比较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推测的。在论及《六朝诗集》和《唐十二家诗集》的刻工姓名时,杨焄同志根据张振铎编《古籍刻工名录》纠正了杜信孚等《明代版刻综录》之误。这也可见他涉猎之广和用心之细。

由于杨焄同志对所论诸集的内容及有关资料都一一细心读过,因此发现了不少古人今人的讹误或不足之处。下面举几个例子:

《四库全书存目提要》总集类论及唐汝谔《古诗解》和唐汝询《唐诗解》时,误以汝询为兄、汝谔为弟,且以为《唐诗解》之编撰在前。本论文指出:其实汝谔为兄,汝询为弟,而且《古诗解》编撰在前,《唐诗解》在后,只不过《唐诗解》先成而梓行于世,于是使人产生错觉,以为《唐诗解》先行编撰。

隋炀帝《春江花月夜》之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冯惟讷《古诗纪》云:“《玉台》作共。”(按:指“带”字作“共”)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引冯氏语,又按云:“《玉台新咏》无此篇”。本论文指出:其实冯氏所谓《玉台》不是指徐陵编的《玉台新咏》,而是指明人郑玄抚编的《续玉台新咏》。《续玉台新咏》原来附刻于《玉台新咏》之后,冯惟讷编《诗纪》时,常常采录其中异文,写入注文之中,而径称为“《玉台》”。

张谦、王宗圣所编《六朝诗汇》,嘉靖中刊行,该集文字有不少与别本不同,也可供整理六朝诗集者参考。其中有的已为冯惟讷所采录,有的则尚未引起注意。如庾信《和赵王看妓》“细茵钟钿

板，圓花釘鼓床”，《六朝詩匯》注云：“一作‘膺風蟬鬢亂，映日鳳釵光’。”馮氏《古詩紀》采錄之，但未注明依据。逯欽立先生亦仅据《古詩紀》录入，未得其源。从古籍整理的角度说，当然是尽可能注出较早的依据为好。本论文即予以指出。又隋炀帝《晚春》“穿林鸟乱飞”，《六朝詩匯》小注云：“一作‘归林鸟倦飞’”，则尚未见于他书。本论文亦拈出之。又《六朝詩匯》卷六十二录萧推诗。注云：“一作‘推’。”逯欽立先生误将萧推、萧推作为两位作者录入。逯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功於学术甚巨，但该书囊括上下千餘年的诗歌，引用四部书数百种，而且其撰集时作时辍，拖延二十餘年之久，故不能毫无阙失，正赖后来者补苴罅漏。应该说杨焄同志的论文对于今人在逯先生辛勤劳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六朝诗歌，颇为有益。

旧传曹植《七步诗》，几乎家喻户晓。但或以为并非曹植所作。有的学者认为第一个起来否定七步诗为曹植所作的是清人卓尔堪。本论文则指出是明人刘成德。刘氏为正德六年（1511）进士，编《汉魏诗集》十四卷，以七步诗列入“无名氏可考”的第十四卷内。

南朝诗有陆凯《赠范晔》一首，“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也是脍炙人口的诗句。但关于其作者、本事，启人疑窦，古今表示怀疑者，颇不乏人。现代学者多引录唐汝谔《古诗解》，以为唐氏是最早提出疑问的。本论文指出：实际上在唐氏之前，杨慎已经提出此疑，唐氏乃是转述杨慎之语。

凡此之类，看似细小，但是认真的科学研究是不能忽视它们的。也只有认真地下苦功夫、死功夫才能在这些地方精益求精，有所前进。在一个学术浮躁的时代，我们是太需要发扬这种负责任的学风了。

《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研究》不仅以认真踏实的文献调查、考证见长，而且能大处着眼，从总集编录中看出明代诗学的演

变。

比如论述杨慎所编《五言律祖》时,便分析明代复古派对于六朝诗歌的态度,指出复古人士虽然也明白六朝诗在律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总是举沈佺期、宋之问以后的盛唐作者为律体正宗和学习楷模,而对于六朝却往往一概鄙视、排斥,甚至有的作者在创作上被认为是效法六朝的,也还是发表指斥六朝的言论。因此《五言律祖》便遭受某些论者如许学夷的抨击。但其书具有特色,其光彩终不可掩,人们也渐渐地认识到它的价值,如七子后学之巨擘胡应麟就说“用修之识,致足仰也”,其《诗薮》所论就显然受到杨慎的影响。这样的分析,让读者对于当时诗学的复杂情况,能有比较真实具体的了解。

又如作为后七子领袖的李攀龙,所编选的《古诗删》受到不少人的批评,认为其去取多不惬人意。即使复古派中人如王世贞、吴国伦、许学夷等也多有訾议,说是“徒为识者姗笑”,“去取之意,漫不可晓”。李攀龙怎么会编选出这样一部诗集来呢?本论文认为,该集有一些特点:一、将李攀龙《古诗删》与他自己的《拟古乐府》相比较,发现《古诗删》所录乐府诗有一半以上在《拟古乐府》中有拟作。二、该集多选六朝人的拟古之作。三、该集选陶渊明诗甚多,远过于陆机、潘岳、左思,这当与李攀龙当时罢官隐居的心态有关。因此,《古诗删》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六朝佳作选集,也就是说,李氏选录时,并非单单着眼于一般的优劣标准,而是为了适应他自己创作拟古作品的需要而选录,而且与他当时特定的心态有关。因此,该集的不惬人意,尽管原因可能很复杂,但与它是一部充满个人色彩的选集有关。这样的解释,显示出独到的眼光,可以启发读者作深入的研究思考。

再如论徐献忠的《乐府原》,指出该书十分重视探寻乐府诗的本事,常以合不合本事作为评价拟作者的一个标准,进而考察复古

派文人热衷于写作拟古乐府的风气和当时人对此种风气的评论，从而得出结论：徐氏编撰此书，既顺应了这一创作潮流，又针砭其中某些流弊，对于初学者正确认识古乐府、学习写作拟古乐府有所助益。这样结合当时诗坛风气进行论述，就比孤立地论《乐府原》的优劣较有深度。

王运熙先生曾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说服膺“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古训，在研究中取一种“释古”的态度。王先生又强调在研究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时，必须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杨焄同志也正是遵循着这样的路径努力的。笔者认为这甚为可喜，因为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一条正确的道路。入门正还是不正，与以后的能否取得成绩，能够取得怎样的成绩，实在是大有关系。

执笔至此，夜色渐深。想来杨焄同志一定还在灯下读书吧。我们能在同一座城市的天幕下，读着共同感兴趣的书籍，有时还或通过电话，或促膝并座，相互切磋交流，其乐也何如！是为序。时维丁亥岁杪。

目 录

序一	王运熙 (1)
序二	杨 明 (4)
引言	(1)
第一章 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概说	(10)
第一节 明代出版业的发展与汉魏六朝诗歌文献 的流传和影响	(10)
第二节 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的动因	(15)
第三节 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的刊行情况	(24)
第二章 弘、正至嘉靖前期间世的汉魏六朝 诗歌总集	(34)
第一节 何景明《古乐府》与刘成德《汉魏诗集》	(34)
第二节 郑玄抚《续玉台新咏》	(43)
第三节 杨慎《五言律祖》	(54)
第三章 嘉靖中期至隆庆年间问世的汉魏六朝 诗歌总集	(70)
第一节 《六朝诗集》	(70)
第二节 张谦、王宗圣《六朝诗汇》	(84)
第三节 冯惟讷《古诗纪》	(90)
第四节 李攀龙《古诗删》	(101)
第五节 徐献忠《乐府原》与《六朝声偶集》	(109)
第四章 万历时期问世的汉魏六朝诗歌总集	(130)

第一节 梅鼎祚《八代诗乘》	(130)
第二节 张之象《古诗类苑》	(140)
第三节 臧懋循《古诗所》	(148)
第四节 钟惺、谭元春《古诗归》	(156)
第五章 崇祯时期问世的汉魏六朝诗歌总集	(179)
第一节 唐汝谔《古诗解》	(179)
第二节 陆时雍《古诗镜》	(193)
结语	(211)
附录 《毛诗微言》撰者考略	(217)
参考文献	(225)
后记	(237)

引言

本书将结合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状况,着重考察明代人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所编选的各类汉魏六朝诗歌总集的纂辑情况,内容包括编纂背景、编选体例、取舍标准、纂辑过程、版本源流、文献价值,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文学观念。全面系统地研究明代汉魏六朝诗歌总集的编纂情况,对于当前的学术研究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可以认真总结和借鉴前人辑校汉魏六朝诗歌文献的经验教训和具体成果,进而提高汉魏六朝文学史料的整理质量,为日后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提供必要的文献支持;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总集的编纂伴随着明代诗学思潮的发展和嬗变,因此可以通过研究其不同的编纂旨趣和批评特色,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明代文学思想的演进。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对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状况加以简要的说明和回顾。

首先是关于“汉魏六朝”这一时段的划分。如果严格按照这些总集中所收作品的创作时间来命名,应当称之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总集”或者“先唐诗歌总集”,才更为确切。但前者过于冗长,后者又不太习用,所以现在才改用“汉魏六朝诗歌总集”来代替。这样一来长短适中,且较为常用;二来,明人在编选这些总集之时原本就较多使用“汉魏”、“六朝”来命名,例如刘成德的《汉魏诗集》、冯惟讷的《汉魏诗纪》、梅鼎祚的《汉魏诗乘》和《六朝诗乘》、徐献忠的《六朝声偶集》、张谦等人的《六朝诗汇》等等。不过明代人对于“汉魏六朝”,尤其是“六朝”的时间划定并无统一标准,

而且与今人一般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例如徐献忠《六朝声偶集》中所谓的“六朝”指南齐、北齐、梁、陈、北周、隋；而梅鼎祚《六朝诗乘》中的“六朝”则涵盖晋、宋、齐、梁、陈、北朝、隋。但一般而言，明代人在提到“六朝”时都是指自晋迄隋这一时期。如许学夷《诗源辩体》就说：“诗言六朝，谓晋、宋、齐、梁、陈、隋也。白下言六朝，则有吴无隋。”^[1]这些不同的时段划分，都和今人所谓“六朝”多指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六个相继建都于建康的朝代的看法，存在不小的出入。为了便于论述，本书除了在个别特殊的情况下另作说明之外，在使用“六朝”一语时均遵照大部分明人的习惯，指的是自晋迄隋这一时期。

其次是对“总集”概念的界定。中国古代对于“总集”概念的认识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隋书·经籍志四》云：

总集者，以建安以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摯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摭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2]

被视为总集之始的摯虞《文章流别集》是在各家别集的基础上加以芟剪繁芜、荟萃精华的，这样一种编纂方式非常便于读者阅读揣摩。后人对总集的认识又有所发展，《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小序》云：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藪矣。^[3]

四库馆臣将“总集”分为两大类：一类旨在求精，以成为“文章之衡鉴”，相当于《文章流别集》的编选方式；另一类意在求全，以成为“著作之渊藪”，则把挚虞认为应当芟剪的内容也都搜括殆尽。这两类总集虽然归趋互异，但又并行不悖，各得其所。前者固然有利于读者揣摩学习，后者亦可供人披沙拣金。除了这两类，还有一种在编纂方式上较为特殊的总集，即所谓“丛编”。它实际上是诸多别集的合刊本，每一种都各为起讫，彼此之间原本并无关联。但编纂者将它们汇辑在一起，总会有较为统一的取舍标准和价值取向作为指导。就这一点而言，和前两种一般意义上的“总集”并无二致。上述三种不同的总集编纂方式，在明人编选的汉魏六朝诗歌总集中都存在。例如杨慎的《五言律祖》、钟惺和谭元春的《古诗归》、陆时雍的《古诗镜》等，都属于“文章衡鉴”类的总集；张谦等人的《六朝诗汇》、冯惟讷的《古诗纪》、张之象的《古诗类苑》等，都属于“著作渊藪”类的总集；《六朝诗集》《三谢诗》《阴何诗集》等，则属于“丛编”类的总集。为了更加全面地展现明人在这方面的成绩，本书对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总集都会有所涉及。

另外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在于诗歌总集，因此，一些由明人编纂的汉魏六朝诗文总集，如汪士贤辑《汉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张燮辑《七十二家集》、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虽然也相当重要，但也只能暂付阙如。还有一些诗歌总集属于通代性质，除了汉魏六朝之外还包括其他时代，例如刘濂的《九代乐章》，就选录了自汉迄唐九代之诗。对于这类诗歌总集，如果严格依据前面设定的“汉魏六朝”这一时段作为界限，自然应当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但也有某些例外情况，如李攀龙的《古今诗删》、钟惺和谭元春的《诗归》、陆时雍的《诗镜》等，原本也属于这种类型的总集，可是由于其中古诗部分相对独立，且对了解明人诗学思想的嬗变颇有帮助，所以本书也进行了研究。但在论述过

程中,主要还是限定在其中的汉魏六朝诗歌部分。此外,明人还将《文选》中的诗歌辑出,刊行过各种不同类型的《选诗》,其中不少还附有评点或笺注。但就“编选”而言,其所录作品并非根据明人自己的标准;而且从内容上讲,更适宜作为明代《文选》学研究的对象,所以本文亦未作深究。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的一些书目题跋以及诗文评著作已经开始关注起明人所编选的汉魏六朝诗歌总集,对其编纂情况、版本源流以及内容体例等予以记录,间或作一些简要的评论,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不少线索和借鉴。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四库馆臣对大部分现存的由明人编选的汉魏六朝诗歌总集评价不高,将它们列入存目之中,但在论列其得失时却多能切中肯綮,要言不烦。不过,从整体来看,明清两代的批评存在着不少的缺陷:首先,这些评论并没有将总集列入到文学批评的对象中去,也没有认识到总集与创作风尚、诗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就未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进行深入的分析;其次,这些记录往往过于分散零乱,缺乏综合性的研究,这就使得某些不同记录间充满龃龉,因而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诸如编纂者、编辑过程、选录标准等等)尚需作深入考辨;此外,评论者或囿于传统观念,或固执一己之见,并未能秉持公允的态度,对这些总集作出令人信服的评价。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对《诗归》一书的评论,在明清两代形成了聚讼纷纭的局面,论争的双方均攻其一点,不及其馀,因而也就很难达成共识。

近现代以来,随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逐渐形成和发展,不少学者对总集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方孝岳先生在撰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批评》一书中就已经明确地提到:

自从《隋书·经籍志》立“总集”一类,把挚虞《文章